

文化育人

第2辑

2013



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印书馆

主办

对话交流

圆中国梦 育职业人

杨叔子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

王冀生

专访

立德树人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

刘洪一

学术论坛

大学文化的类型学研究述评

王晓阳

解读天津大学百年办学精神和文化性格

李义丹

比较研究

作为教育理论者和现代性反思者的洪堡与蔡元培的比较研究

彭正梅等

院校专题

现代和谐职业人的素质构成与培养模式研究

俞步松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化育人

第2辑

2013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育人. 第2辑/刘洪一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275-9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高等职业教育—文集 IV. ①G71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056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育人

(第2辑)

刘洪一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275-9

2013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frac{3}{4}$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对话交流

- 1 圆中国梦 育职业人 杨叔子
- 7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 王冀生

专访

- 14 立德树人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 刘洪一

学术论坛

- 21 大学文化的类型学研究述评 王晓阳
- 28 关于中国大学精神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王 杰
- 34 论大学精神之研究：从修校史说起 高天明
- 41 释读天津大学百年办学精神和文化性格 李义丹
- 49 大学精神与中国精神 邱小云
- 58 西方“文化分层”理论在大学文化研究中的应用 李曼丽
- 65 通识教育与功利主义 袁祖望
- 71 孕育与传播绿色工业文化：现代职业教育的使命 宋 晶

比较研究

- 79 作为教育理论者和现代性反思者的洪堡与蔡元培的比较研究
彭正梅 底特利希·本纳
- 90 中美高等学校创造性人才培养：比较文化的视角 杨润辉
- 98 台湾地区技职院校通识教育模式特征——以台湾科技大学为例 马早明
- 106 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及其“通识课程”：中英美三国的比较研究 樊大跃

海外新视野

- 114 “校企合作”在影响区域经济创新中的作用 伊恩·奥克斯

院校专题

- 121 现代和谐职业人的素质构成与培养模式研究 俞步松
- 128 关于高职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撒承贤

132	基于人人成才的高职院校协同育人策略研究	刘建湘
139	文化育人：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龚善初 杨伟权
147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地校企外”文化协同育人研究	张志坚
155	基于民航行业文化的特色校园文化创新与实践	吴卫锋 裘宏伟
163	高职文化素质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建构	朱利萍

圆中国梦 育职业人

杨叔子

提 要 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人，不是制造职业机器。文化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与之相应的是人文文化及其价值理性与科学文化及其工具理性。教育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又是文化创新的必要基础；教育定位于文化领域中，其宗旨便是素质教育，从手段上看，教育是文化教育。思想道德素质与职业素质是职业人必须具备的素质，而文化素质又是它们的基础。文化素质是素质的基础，又是基础的素质。培养高素质职业人是圆中国梦不可或缺的条件。

关键词 文化、素质、职业技术、科学、人文

一、人与文化

人因为有了文化，才从动物人变成社会人；因为文化进步，才从野蛮人进步为文明人；因为文化提升，才从一般文明人提升为高级文明人、真正的大写的“人”。这是人类发展的真实的历史本质。大自然创造了人与人类社会；人与人类社会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以文化、文明作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方式，如此，其也可被视为是在大自然作用下自我创造的产物。此即，大自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创造了人与人类社会，而人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一切活动也就必须符合或反映大自然的规律，凡是不符合的或不反映的，就必不能实现或必招致灭亡。而这一切活动的沉淀，无论是感性的或理性的，是具体的或抽象的，就是人与人类对大自然规律的感知、认识、体悟与反应，这就是文化。而且必须认为，这种规律既包括大自然本身的规律，又包括反映大自然规律而使社会能正常生存与发展下去的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道德伦理，而且还包括反映大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而使个人能正常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个人身心活动。程颐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马克思精

作者简介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辟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文化就是“道，一也”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基因”。

文化至少蕴含五个方面的内涵：知识、思维、方法、原则与精神。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相互渗透，彼此支撑，形成整体，但各具特点：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沉淀直接表现为知识，知识是其他内涵的基础；没有知识，就一定没有文化，就一定没有力量。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不一定有力量。思维是文化的关键。没有思维的知识是死知识；有了思维，知识才是活的；知识才能激活自己、发展自己、超越自己；“人为万物之灵”，灵者，思维也。方法是文化的根本。知识、思维要付诸实践，才有作用；付诸实践，必须有方法；方法是道路，是桥梁，而且一切创新必源于实践。原则是文化的精髓。它融于前三者之中，指导着前三者。这四者属于形而下，可谓之“才”。精神是文化的灵魂，它是前四者的融合与升华，它引领着前四者，又渗透于四者之中，属于形而上，可谓之“德”。天道在文化上反映的精神主要是求真，人道在文化上反映的精神主要是求善，无论是求真还是求善，本质上都是求和谐、求完美。如后所述，与天道相应的是科学文化，与人道相应的是人文文化。文化最重要的是其精神；有什么样的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据人类所知，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类生命体活动的历史沉淀成为其文化，文化既折射着大自然规律的万丈光芒，更永垂不朽地放射着人类夺目的精神光辉。只有人，只有人类社会，才能如此！人与人类社会创造了文化，反之，文化也创造了人与人类社会。从而，可以认为，人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本质上就蕴含了“文化”。人在人类社会活动中，所接触的、所感受的、所体验的、所认识的、所受影响的、所能赋予的等等，无不与文化有关。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就是人的“社会”化与社会的“人”化，就是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文化就是“人”化，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物。以“文”化人，主要指用“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来升华人的精神世界，来打造人与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使人真正成为大写的“人”，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类的社会”；而以“人”化物，主要指用“文化”，特别是“科学文化”，来改变人与人类社会相处的物质世界，打造人与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使之适合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二、科技与文化

科学文化，主要是关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是人的“立世之基”、人类社会的“文明之源”；没有科学文化，就落后、愚昧、荒唐，不但因为不知客观世界规律而难立于世，并且必定失去社会文明发展的源头，必定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奴隶的地位！然而，人文文化是人的“为人之本”、人类社会的“文明之础”；没有人文文化，就野蛮、卑鄙、无耻，不但因为丢失人文关怀而异化成人的对立面，而且必导致社会文明的彻底崩溃！《周易》讲得多么准确：“文明以止，人文也。”“以止”者，立足、栖身也。

环顾全球，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科学文化及其工具理性严重冲击着人文文化及其价值理性，导致人类社会面临巨大困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贫富差距的急速加剧、世界的动荡不安、人际关系的尖锐对立，如此等等。企图以科学文化及其工具理性来引导人类社会走出困境，正如有人指出，其结果必定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将以“无明”而告终。

特别在我国的今天，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文化建设特别是人文文化、民族文化建设严重滞后，导致了一系列时弊的产生与泛滥。1995年，当时国家教委针对时弊，顺乎潮流，涉及育人这一根本，提出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切入点。周远清同志代表国家教委提出，要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包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与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对高职学生而言，就是职业素质）；这四者分别是素质的灵魂、主干、保证与基础。文化素质之所以是素质的基础、基础的素质，正因为文化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历史沉淀，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社会的“基因”。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延续靠文化这个“基因”的传承，而其发展与进步则靠文化这个“基因”的创新。这个“基因”反映了、从而沟通了、进而统一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从一定角度来看，马克思讲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主要靠人类的生物基因，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本主义”，主要靠文化这个社会“基因”。

一个人的素质就是一个人的生物基因和其文化“基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融合。生物基因一般难于改变，而文化“基因”不但具有极大的可塑性，而且在同生物基因相互作用时，严重影响生物基因潜能的发挥与体现。具体讲，素质就是一个人在其先天基因（即天生禀赋）的基础上，在后天环境（社会、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浸染中，通过个人的学习、思考、实践等活动，在这一切的文化作用下，所形成的一个人

稳定的内在品质。人的生物基因具有极大的潜能，人一旦受到文化“基因”的作用，成为了人，就具有了主观能动性，不但可用来改变自己，还可以用来改变个人本身与环境的关系，乃至改变环境。因此，合适的外部各种作用可以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人的素质。显然，作为与学生最亲近的文化承载者与践行者，在家庭中的父母和在学校中的教师，对学生素质的提高具有关键作用。或者讲，这就是在人通过生物基因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完全可以通过其主观能动性来深层次地实现自然界可能实现的人本主义。

自然界实现人本主义，文化成为人类社会“基因”，教育在此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生物基因靠自然的遗传而延续，靠自然的突变而演化，但文化这个社会“基因”靠人类社会环境（其中最主要靠教育）来延续与传承，并且教育又是这个“基因”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与前提。显然，教育定位于文化领域中，不能定位于经济、政治领域中；教育的定位不能越位，也不能错位，教育不能干“文革”，也不能干“下海经商”；不然，定位不对的教育必然摧残教育本身，必将严重阻碍乃至促退社会的发展。教育就是育人，最根本的是以“文”化人，并且同时使人有能力以“人”化物。这就是讲，教育的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最根本的是提高“做人”的素质，这就是教育的本体性，这主要是由人文文化的价值理性所决定的；同时，也要提高“做事”的素质，保证人有能力以“人”化物，使得社会进步，加快社会现代化进程，这就是教育的工具性，这主要是由科学文化的工具理性所决定的。

所以，一方面，从教育的宗旨上讲，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另一方面，教育的手段是文化，以文化来育人，来提高国民素质，所以，从教育的手段上讲，教育是文化教育。由此可见，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决定了教育本身的本体性与工具性。对这“两性”而言，价值理性、本体性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人应是“人”，不是物，不是禽兽，更不应是异化了而成为“人”的对立面的人；但是，工具理性、工具性也必不可缺，十分重要，否则，就不能以“人”化物，社会就不能进步，人的素质也不可能得以不断提高。前者统率着、激活着后者，后者体现着、升华着前者。其实，这就是司马光所早已深刻揭示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力主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三、高职与文化

当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不应只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而应是大半壁江山。从

事科学、技术、工程的科技工作者都知道，如果研究人员是1人，那么，设计人员是10人，工艺人员是100人。科学技术是否发达，创新力是否强，一个关键指标是技术依存度，即关键技术依赖进口的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发达国家技术依存度为10%，即100件关键技术10件靠进口；日本为6.6%，美国为1.6%，而我国那时却远远高于50%。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我国到2020年技术依存度降至30%以下，显然，此数字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极大差距。

事实上，我国许多关键技术不过关，不是因为不了解原理、方法，而是工艺技术不过关，即由于没有掌握相应的工艺技术，即使得到好原料，却做不成好材料，制不出好零件，装不出好组件，成不了好部件，生产不出好装备、仪器，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同高级的、熟练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高级技工）缺乏相应的人文文化极其攸关。在国际上，最保密的、鲜见于专利的、在产品质量上起巨大作用的，就是关键的工艺技术。我国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无疑是极为正确的。实际上，我国职业技术教育问题并未得到全面、系统的认识与解决，这还涉及职业技术教育体制上的深层次问题。职业技术过不了关，科学技术过不了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能圆。

提高高级职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素质无疑十分重要。然而，在今天市场经济逐利的大潮猛然冲击下，拜金主义泛滥成灾；社会要进步，民族要复兴，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则是核心之所在。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思想境界、思想觉悟，决定着一个人前进的动力大小，严重关系着一个人创新的能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困难、险阻不能攻克、越过？！但深一层讲，无论是思想道德素质还是职业素质，都必须以相应的文化作为基础，即以相应的文化素质作为基础，因为这会深深涉及人的精神境界如何，同时也会深深涉及人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如何，而人的精神境界则是人能否成为“人”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础上人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则是人能成为或达到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所在。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人生价值取向即价值理性的问题。其锋芒针对加强人文文化教育，解决好做人的问题；重点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做中国人的问题；核心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交融，解决好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这里不仅强调了思想境界、价值理性的提升，而且也蕴含了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的发挥。恩格斯讲得好：“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

这就是讲，高职院校不是用来制造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没有思想境界的而只能按已有程序运转的职业机器，而是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具有与外界和谐相处

的思想境界的、既能爱国又会创新的高素质职业人，成为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技术力量。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
- [2] 马克思. 1984 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刘丕坤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涂又光. 中国高等教育史论 [M]. 武汉：湖北教育报刊社，1997.
- [4] 周远清. 周远清教育文集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5] 余东升. 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研究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6] 杨叔子. 杨叔子教育维论选 [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 [7] 王中字. 文化与野蛮 [N]. 科学时报. 2010-06-25 (07 版).
- [8] 杨叔子. 素质·文化·教育 [J]. 高等教育研究，2012，(10)：1-7.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2.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

王冀生

提 要 大学教育是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大学精神是大学教育的灵魂，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它渗透在大学存在的一切方面和办学活动的一切领域，其核心是一种崇高信仰。一定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对大学精神的变迁产生深刻影响。经过改革创新和顽强拼搏，一个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必将屹立在世界东方。

关键词 大学精神、文化使命、灵魂

作者简介

王冀生，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顾问，研究员

“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是一项重大哲学命题，其实质是追寻“当代中国大学应该向何处去”的根本方向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众所周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大学文化主要凝聚在大学人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它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受到教育、大学的本质及其规律和一定社会文化形态的多重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反作用，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大学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大学精神与大学理想和时代精神是紧密相关的。大学理想是大学人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办什么样的大学”的一种向往和期盼。大学精神是大学人在为实现大学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受到一定社会文化形态，特别是一定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经过历史的文化积淀，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它渗透在大学存在的一切方面和办学活动的一切领域，具有群体凝聚、价值导引、精神陶冶和辐射社会等众多品质和功能，其核心是一种崇高信仰。由此可见，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如果没有大学理想的积极引领，没有大学人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整个大学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所大学不可

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灵魂的大学，也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

教育的本质是认知活动还是生命活动？这是教育哲学的一个重大命题。有的人说“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活动是一种从接受间接经验和学习前人已经掌握的知识开始的认知活动。这句话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教育活动的确是从接受间接经验和学习前人已经掌握的知识开始的。但是，这仅仅是现象，而不是本质。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康德精辟地指出，“人是需要教育的唯一的生命”，“人只能通过教育而成其为人”。

以马克思和康德的精辟论述为指导，我们认为，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促进人的发展的一种生命活动。主要论点是：第一，教育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有生命的人，教育负有开发人的个性和潜能、革新人的天赋、养成健全人格、提高人的素质、增强人的智慧、为人的一生奠基的使命；第二，“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永恒的主题，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成为“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人”；第三，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是以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基础的，“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关键在于通过“文化养成”促使受教育者实现从有文化知识的人向既有文化知识又有文化修养的人的深刻转变；第四，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培养能够传承和创新文化的人来推动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教育以人为本和服务社会是辩证统一的。

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在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教育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教育的本质及其“文化育人”的理念我们必须自觉地坚守。

二、大学的本质及其应当承担的重大文化使命

经过长期的发展、变革，现代大学具有教学、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项基本社会职能。英国教育家纽曼说过“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蔡元培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美国教育家克拉克·科尔说过“大学是一个‘服务站’”。但是，这些大师的至理名言并不是对大学本质的深刻揭示。

人类有三项基本社会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对应的三种社会组织，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一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广而言之

是经济活动，从事这项活动的主体是经济组织，主要代表是企业。二是治理国家和对外交往的政治活动，它主宰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事这项活动的主体是政治组织，主要代表是政党和政府。三是文化传承和创新活动，它既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从事这项活动的主体是文化组织，主要代表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由此可见，在宏观上，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传承和创新文化是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文化使命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我们对其应当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由于文化知识是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高深知识及其构成的学科（专业）是大学存在的知识和组织基础，因此，我们应当把传承和创新文化知识，特别是传承和创新高深知识作为大学完成重大文化使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必须明确，在传承和创新文化知识和高深知识的基础上，大学应当把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文明守卫、文化育人、求真创造和引领社会的重要功能作为完成重大文化使命的核心和灵魂。“文明守卫”，就是牢牢把握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继承和发扬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正义、区分善恶、明辨是非和建立信念。“文化育人”，就是通过传承和创新文化，促使受教育者成为既有文化知识更有文化修养的人，以天下为己任，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延续和发展。“求真创造”，就是既要认识已有的客观世界，更要创造未有的新世界，坚持真理，改革创新，直接为人类社会谋福祉。“引领社会”，就是把大学建设成为发展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以自己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文化既服务社会又引领社会前进。其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大学特有的文化选择和价值批判功能，这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力之所在。

三、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对教育和大学的深刻影响

从根本上说，教育和大学是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的。由于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是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基础的，因此，一定社会的文化形态的变迁，特别是随着社会转型出现的主导文化形态的变迁，必然对教育和大学的发展、变革，特别是对大学精神的变迁产生深刻影响。

我国曾经长期处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比较简朴，但精神却是比较高尚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深厚的中华民族人

文底蕴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得以积淀。我国先秦时期《大学》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不仅开创了我国探索大学教育本质及其规律的历史的先河，而且倡导了一种我国独特的大学精神，其核心是“明德济世”，其精髓是“人文化成”，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人文化成”这一词语在我国最早见于《易经》，《易经·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傅璇琮、李克主编的《四书五经》对《易经·贲卦》中这句话的注释是“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由此可见，“人文化成”有两个目标：一是“推行教化庶民”，要求通过格物、致知、正心，特别是通过“修身”教化庶民，使其成为通晓儒家经典和道德完善的君子 and 士；二是“促使天下昌明”，要求庶民在成为君子 and 士以后，能够以天下为己任，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文明和昌盛的社会。我们认为，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它所倡导的以“明德济世”为核心和以“人文化成”为精髓的我国传统大学精神应当是永恒的。

在“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里，西方大学一直处于“象牙塔”之内，以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有理性”是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的基本论断为指导，坚守“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准则和以“发展人的理性”为宗旨的“自由教育”思想。中世纪以后，学科成了大学的细胞和承载大学职能的基础平台，并且奠定了以“学术自由，学校自治”为基本特征的近代大学制度的根基。19 世纪初叶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之后，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巨大作用，人类社会逐渐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向“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型。在工业经济社会里，由于人文学科的非生产性、非营利性和非直接应用性，它在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大学不仅把学术研究功能引入大学，促使严格意义的科学活动进入大学这个学术殿堂，而且在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会中去以后，在积极应对现实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的同时坚持大学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学术价值。由此可见，在坚守古希腊“象牙塔”精神的基础上，以“求真创造”为核心和以“科学理性”为精髓的西方近代大学精神同样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

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变革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哲理和发展阶段不同，人类逐渐形成了两种大学精神传统，一种是以“明德济世”为核心和以“人文化成”为精髓的中国传统大学精神，一种是以“求真创造”为核心和以“科学理性”为

精髓的西方近代大学精神。应当说,这两种大学精神传统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但又各有侧重,并不完善。我们应当在实践中努力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为实现人类社会和大学未来的共同理想而奋斗。

四、“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一种崇高信仰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和大学的发展、变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直存在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潮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反映在大学精神上,在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表现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我国大学传统精神和西方近代大学精神都面临着“工具理性的严重挑战”,知识取向和偏重应用在大学教育和办学实践中逐渐占了上风,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探索未知这个大学赖以生存的根基。正是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尖锐地指出:教育和大学“必须进行最彻底的变革和创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这种状况充分说明,大学精神的衰微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性的话题,人们惊呼“大学处于危机之中”。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1978年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中,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试图以实用主义为基础,在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主要的哲学基础之间实现某种平衡。但是,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中不得不承认,“尽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他随之提出警告说:“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令人遗憾的是,约翰·S.布鲁贝克1978年发出的这个警告,今天已经变成严酷的现实。

从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到20世纪80年代“从‘拨乱反正’到‘三个面向’”,我国教育战线已经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划时代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为我国人民解放、经济腾飞、社会进步

和民生改善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我国大学欠缺相应高度的文化自觉，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在前进的道路上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实质是大学文化缺失现象，突出表现是教育活动本义的缺失、大学的创造力不足、官僚化气息对大学的侵袭严重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教育、学术腐败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朱人求在其学术专著《儒家文化哲学研究》中深刻地指出：“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人道目标之间发生了冲突，出现了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尤其是‘一战’、‘二战’的爆发把科学理性的副作用充分暴露了出来，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精神状态的严重颓废和衰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可以说，正是社会历史本身，促使西方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把精力集中到文化问题上来，注意探讨文化的本质，提出文化反省的要求，于是，文化哲学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在近年来我国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学术著作《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在当代中国的问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通过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的根本在人，最终目标是促使作为“个体”的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离不开“科学理性”的强力支撑。“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也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关键在于坚持“人文目标”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这是全世界人民和大学的共同使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开展“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教育和大学的本质及其规律，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走“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构建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坚信，经过改革创新和顽强拼搏，我国大学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